

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变化与策略调整

欧阳向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当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具有社会思潮交织、手段多样、关键时点搅局等新特点,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构建全方位对华认知作战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对中国展开攻击。风险成因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国际政治格局和科技发展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带来新变化,会危害国家安全、引发国家间冲突。对此,我国应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进与他国的理解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际安全;舆论风险;斗争策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25)02-0047-10

DOI:10.16436/j.cnki.52-5023/d.2025.02.001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对华认知战和舆论斗争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意识形态斗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继经济封锁、军事干涉和政治高压等失败后必然采取的一种手段,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人类未来的重要策略。^[1]网络时代,在科技飞速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2]

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总体特征和时代特点

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涉及诸多领域,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像具体的物质实体那样直观。对于同一社会现象,不同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主观解读的差异增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其次,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的冲突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收稿日期:2025-02-2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女,吉林洮南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经济学。

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发展,这种稳定性与动态性交织的特点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再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参与主体多元,包括国家行为体、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媒体机构、宗教组织、私营企业以及个体传播者等,其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是学术团体和宗教组织。在一些学科领域,如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极端宗教组织会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主流的、温和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世俗意识形态产生激烈冲突。最后,认知分析是国际意识形态分析的一个重要路径,“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3]。认知战通常具有隐蔽性和非对称性,实施者采取隐蔽手段进行操纵和干预,目标受众不易察觉和防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不同于以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如下新特点:

(一) 社会思潮交织, 舆情更加复杂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活跃,试图在网络空间扩大影响力,从而引发网上意识形态的对峙。如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倡导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片面的、错误的解读或歪曲,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企图动摇人们对本国历史和发展道路的信心;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对其他民族或国家持有强烈的敌对态度,甚至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来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规范、文化观念等进行质疑和否定,反对权威和中心,倡导多元性和平等性,主张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构成了挑战。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经济分析、预测到道路指引、判断,从经济问题发力,向多个领域蔓延。一些网民在错误思潮影响下,无视我国国情和发展事实,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中国同西方的优劣对比,陷入中国不如西方的思维陷阱,形成与主流价值取向相悖的舆论场。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威胁更隐蔽,“高级黑”和“低级红”极易在潜移默化中对网络舆论形成误导,从而为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提供更多机会。

(二) 手段丰富立体, 方式更加多样

国际认知战是以信息为主要载体,通过影响和塑造目标国家决策者和群众的认知,进而控制和改变其行为,最终达到战略战术目的的现代战争形态。具体手段包括:挖掘个人的情绪和心态、塑造他们对事件的看法、认知和心理模型,以及分裂团体、联盟并削弱抵制对手意图的政治意愿等。它的手段丰富立体:国家行为体通过官方媒体、网络宣传机构甚至与他国极端组织合作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利用网络和资源传播虚假信息推动特定议程,国际媒体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扮演舆论引导等多重角色,自媒体受政治与商业利益影响加入认知战,私营企业出于各种目的也自发制造虚假信息。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书刊、报纸等信息传播优势对新闻舆论阵地实施控制。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短消息平台(如微博)和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朋友圈)用户可以快速分享自己的见闻和观点,产生即时信息,并通过用户的层层转发或好友关系链,使信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传播。短视频平台(如抖音)的火爆更吸引了大量创作者,用户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进行创作和发布。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平台能够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视频精准推送,吸引大量用户的关注。移动新闻客户端(如今日头条)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地理位置、兴趣爱好等因素,为用户个性化推荐新闻资讯,不仅方便用户在移动设备上随时随地获取最新新闻,还能对新闻进行评论和分享。

游戏直播平台(如斗鱼)、电商直播平台(如淘宝直播)、在线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都凝聚了大量用户,具有成为意识形态传播平台的潜在可能性。国际认知战利用现代视频技术、“算法认知战”等新形式,将全球新闻传播由电视时代切换到了智媒时代的“掌上直播”模式,从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迭代成为由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辅以换头、虚假配音、画面拼接等技术,体现出战略性、短视频化、情感化、真假难辨等特点。人工智能技术与脑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和网络空间的融合和集成将进一步加深认知战的深度和广度,进而重塑全球安全环境。

(三) 关键时点搅局, 渗透力度空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把认知战作为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开展“颜色革命”的主要手段,具有力量构成多样、技术手段先进、装备谱系完善等特点。例如,在乌克兰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暗中支持亲西方的政治势力,通过资助反对派候选人、操纵媒体舆论等手段,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最终颠覆政府,导致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西方势力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往往会提出苛刻的援助条件,重塑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使其更加符合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在全球经济出现波动时,西方国家常常会以汇率操纵为由指责新兴经济体,实际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和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而采取的搅局手段。

中国是西方敌对势力炮制意识形态陷阱主要针对的对象。在关键时间节点,西方敌对势力必然会伺机干扰破坏,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他们以各种舆论事件为由头臆测我国未来发展进程,对党的政策理论加以曲解恶评,趁机攻击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西方敌对势力还以人权、民主、自由为幌子,吸引和争取海外舆论与政治势力的关注同情,企图施压中国大陆,影响海外舆论。随着“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在国际上持续抬头,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制定各类利己政策加强大国不正当竞争,出台各种措施,或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与舆论攻击,企图从经济着手遏制中国崛起,损坏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与国家形象。“哑嗓子”已经与“卡脖子”一样,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4]

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视认知战、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等研究,通过物理域的行动、信息域的运用、认知域的攻防,进行立体化的大规模传播,以达到粉饰自己、攻击他国、维持霸权的目的。美国假借“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公平贸易”之名,将意识形态作为攻击中国的武器,运用议程设置、热点话题进行炒作,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合理化”。对华认知战以攻击中国各项基本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为最终目的,主要表现为:

(一) 政治上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分离, 宣扬最小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确保国家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重大决策中,充分考虑人民的需求和福祉,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例如,在脱贫攻坚期间,中国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成功让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脱贫,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幸福的本质特征。然而,在美国的对华认知战中,美国将中国刻画成不尊重个人、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形象,认为有为政府必然导致

腐败,只有在市场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中,政府才能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美国无视本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无视政府的行动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往往受到利益集团制约的困境,充当别国发展模式的“教师爷”,是霸权思维的典型体现。

(二) 经济上放大制度差异, 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保留了对重要领域的产权控制,同时也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强调共同富裕,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发挥市场优胜劣汰和全球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产生的一切问题都靠市场自行消化和解决。在对华认知战中,美国攻击中国“权大于法”,认为“有形的手”干预过多,是对“人权”和“自由”的破坏。美国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利用中国入世议定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挑起与中国的经贸纠纷。这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调整原先的计划经济制度,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采取国家宏观调控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与美国推行的制度不相吻合却大获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提供了先例,自然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

(三) 文化上强调价值观不同, 塑造中国的“另类”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强调集体主义、家庭观念和社会责任,注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肯定先人后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美国的丰厚福利、优质教育和移民方式吸引了众多海外移民申请者,这让美国人具有种族优越感,形成美国中心主义,也让美国人更加坚信美国肩负引领人类的使命。在美国的对华认知战中,中国人不仅是“经济动物”,而且是“异教徒”,因此世界绝不可以由中国来“领导”。这种排外主义不仅针对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也一样。

与政治上的“民主与威权”、经济上的“自由与管控”叙事并列,西方在文化上炮制“个人与集体”和“现代与古老”的对立。例如,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中,集体主义精神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思想保障,却被西方媒体片面地解读为个人利益牺牲。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被视为等级社会的封建礼教,用来凸显中国文化的“落后”形象,却忽视其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中的积极意义。中国价值观被贬低和歪曲,而西方价值观通过控制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大行其道。

(四) 军事上抹黑中国, 在“印太”区域制造紧张局势

中国始终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地认为通过对话协商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推动多边合作,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中国积极斡旋,倡导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为地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则倾向于维护军事优势,通过战争手段来维护国际秩序。近年来,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存在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攻击中国军费开支增长过快,却无视自己是军费开支第一大国,而中国的军费开支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

俄乌冲突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相提并论,通

过一系列涉台法案或决议。2024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与台湾企业签订国防协议进行可行性研究,推动“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参考美国和乌克兰现行的合作模式,允许美国盟友或者伙伴向私人企业采购军事武器和装备给台湾。2024年2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声称“两岸互不隶属”,谴责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态度,还表示欧洲国家的船只要去台海进行“自由航行”,甚至希望台岛参加诸多国际组织。回望2021年5月,七国集团在伦敦举行外长会议,在公报中就涉疆、涉藏、涉港问题及东海、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声称“支持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这些举动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为“台独”站台,甚至不惜将台湾“乌克兰化”,为其“以台制华”战略服务。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公认的常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却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支持“台独”,这种双标行径暴露了其虚伪的本质,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上混淆是非。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中国唯有坚定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五) 主权上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通过舆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的典型案件是新疆棉事件和香港修例事件。反华势力编造谎言,通过操纵部分西方媒体发布毫无根据的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虚假报道。一些西方品牌和跨国公司闻风起舞,抵制新疆棉花。这不仅导致新疆棉农和纺织企业陷入订单减少、市场萎缩的困境,同时也扰乱了全球纺织品贸易秩序。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新疆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新疆社会大局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各民族和谐相处,所谓“强迫劳动”完全是恶意编造的谎言。在香港修例事件中,西方反华势力也充当了幕后黑手。他们把修例描述为所谓的“侵犯人权”事件,公开支持反中乱港分子,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和所谓的“精神支持”。西方媒体也配合进行不实报道,将香港警察正常执法污蔑为“暴力镇压”。外部势力还通过非政府组织向香港的激进势力提供资金、物资和培训,企图将香港变成反华的前沿阵地,破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香港的法治稳定。

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长期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听、监听、监控,对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如2021年12月21日,“五眼”联盟国家外长发表涉港联合声明,公然对中国香港事务横加干涉,处心积虑攻击香港选举制度,抹黑特区立法会选举。中国坚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六) 在国际舞台上炮制谣言,诬蔑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起“秘密活动”,散布关于中国政府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谎言,并向海外媒体提供针对中国的诽谤信息。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美国中情局还对东南亚、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发起秘密的舆论干预行动。美国媒体声称中国在美国关键的电力和通信网络中植入了恶性软件,企图制造恐慌,挑动对立情绪,以此打压中国通信企业。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俄关系成为热点话题,一些挑拨中俄关系的虚假信息意图较为明显。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先后炮制“事先知情论”“袖手旁观论”“军事援助论”等,诬蔑中国“站在侵略者一边”,为其实行“长臂管辖”提供基础。实际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

客观公正立场,习近平主席曾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等,为缓和局势指明方向。中方还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积极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无视事实,在相关会议上诬蔑中方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要求中方停止向俄罗斯转让军民两用材料,并威胁制裁为俄罗斯“提供协助”的中方实体,包括金融机构等,试图破坏中俄正常经贸合作。2024年3月,美国借第三届“民主峰会”之机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以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是一场“针对假想敌在意识形态领域捣鼓出的‘政治秀’”^[5],而非真正促进民主与自由。近年来,美国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并引领其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冷战思维已很明显。

三、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形成的根源及其对我国的危害

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调整,使得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舞台上相互碰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和文化优势,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输出,干扰其他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努力维护自身产业安全 and 经济安全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中美意识形态分歧为例,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决定人类未来命运与前途的斗争,解决谁胜谁负的最后问题,必然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反映出来,又往往聚焦在意识形态斗争上,意识形态的较量表现得越发白热化。”^[6]一方面,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背景;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加剧了中美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也给全球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如美国全球政策调整、欧洲安全格局和一体化挑战等,在重塑国际关系的同时也影响国际意识形态变化。

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使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演变更加复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这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以往我们认为技术是中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背后的使用者。随着机器学习的深度展开,人工智能不单纯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发挥作用,它还基于数据库隐匿地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错综复杂。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机制深蕴资本逻辑,存在算法黑箱、数据偏见等弊病,只生成内容,无法辨别内容本身的真假,而虚假信息往往因为博人眼球、迎合用户被推送至信息前沿,使信息场域真假难辨,进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难度加大,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只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扶持、开发、利用好更多诸如DeepSeek和TikTok平台,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抢占舆论先机,反制对手。

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风险对国家安全有着严重的危害。外部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直接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渗透可能引发民族认同危机,使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分歧,削弱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损害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某些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输出、信息传播等手段,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传播其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动摇目标国家党的执政根基。不良的意识形态还会破坏文化生态,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导致文化庸俗化、低俗化和虚无化。一些极端的意识形态可能会鼓动民众采取激进的行动,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近年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风险不可低估。如2000年塞尔维亚发生的“推土机革命”,就是西方势力利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比如经济困境和部分民众对政府选举程序的质疑,通过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多种渠道,煽动反政府情绪,最终导致政权更迭。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也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案例。西方势力利用格鲁吉亚当时失业率较高、民众对政府心怀不满等情况,资助反对党,操纵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反政府宣传。在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反对派声称选举舞弊,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导致政府倒台。2004至2005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也是由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被西方势力借助和利用,在乌克兰投入大量资金扶持亲西方派别,使乌克兰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10至2011年突尼斯事件以及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权发生更迭。这些国家在政权交替后,政治局势并没有迅速稳定下来,反而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混乱,社会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内部问题固然是“颜色革命”的内因,但外部势力干涉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其手段往往通过搅乱意识形态、资金支持反对派、媒体操控宣传等,在目标国家制造混乱,以达到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治目的。

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还可能引发国家间的紧张和冲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时,虚假信息会干扰各国之间的合作,延缓问题的解决,给全人类带来更大的损失。当一方被虚假信息误导,对另一方采取不恰当的政策和行动时,容易导致国际关系的恶化。新冠疫情后,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总体态度恶化加剧,其负面影响在2021年达到近四十年的历史峰值。2021年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议美国从2022至2026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不断的污名化操作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舆论整体偏向负面,美国民众倾向支持政府的强硬对华战略。在中美博弈公开化和激烈化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极力避免选边站队,一方面又被西方裹挟进“政治正确”阵营。从这一点上来讲,“民主对威权”的叙事是十分有害的,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高效率应通过案例在国际社会进行分享。

四、新时代我国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调整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社会思潮较量的工具,舆论斗争一直被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1940年5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明确要求:“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7]胡锦涛要求“对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要针锋相对地开展舆论斗争。”^[8]习近平指出:“要高度重视网上舆论斗争,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9]。面对新时代国际意识形态风险有增无减的局面,我们应坚定

“四个自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推动国际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一) 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不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照抄照搬。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既保证了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掌控,又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力。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国家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重大决策中充分考虑人民的需求和福祉。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强调集体主义、家庭观念和社会责任,培育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面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时,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不为外部干扰所动摇,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在应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和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巨大的优势。在面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时,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重大事件时,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政府能够迅速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面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时,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

(二)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因此,我们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稳定性。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中国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提高治理能力。中国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治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对治理能力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三是加强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中国要加强科技创新,

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

(三) 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中美意识形态分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文化交流活动、媒体传播、学术研讨等,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实面貌,也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文化展览,展示中国传统艺术、民俗风情和现代文化创新成果,让世界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传播中国的发展理念、科技创新成就和人文关怀,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和误解。

传播中国声音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舆论场的对话。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我们要及时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反恐、核不扩散等问题上,中国积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展现大国担当。通过外交渠道、国际会议等平台,与各国进行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求。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价值,如“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将其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同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阐释,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成功经验。展示中国形象要注重全面性和客观性。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更是一个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文化传承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我们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在脱贫攻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成就,树立一个积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0]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都是为了实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例如,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持,展现了大国担当。同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增进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扩大发展共识的重要基础。中国始终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无底线退让,甘受霸凌。近来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遏制打压,将关税作为极限施压、收割利益的工具,中国在第一时间坚决实施必要的反制措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反对美国霸凌霸道行为。这既是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义之声,也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贸易规则的正当之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困难和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其中也包括向美开放。作为世界大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中美两国应该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两国可以通过加

强技术合作、提高能源效率、推广清洁能源等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公共卫生方面,两国可以加强防控合作、分享经验技术、共同研发疫苗等,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4.
- [3]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7.
- [4] 赵可金.中国全球战略传播中“哑嗓子”问题及其对策[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1):107-116.
- [5] 朱瑞卿.傲慢与焦虑——起底美国对华认知战扭曲心态[EB/OL].(2024-03-19)[2025-01-13].<http://www.news.cn/world/20240319/944ac409863546eb959aa59753ba13c4/c.html>.
- [6] 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07.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4.
- [8]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61.
-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29.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75.

New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Struggles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s

Ouyang Xiangy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urrently,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struggles have new features such as the interweaving of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diverse means, and disruptions at crucial moments. The Western bloc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warfare system against China, launching attacks on China in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causes of the risks lie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ideologies, and the new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struggles, which will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trigger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In response, China should firmly uphold the “Four Spheres of Confidence”,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enhance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with other countries, jointly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so as to safeguard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opinion risks; struggle strategies

责任编辑:余爽悦